



人·民·文·庫
人文科学·撰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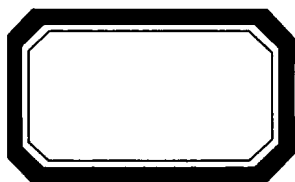
长水集

【上册】

谭其骧 著



人民出版社



文·库
· 撰 著

长 水 集

【上册】

谭其骧 著

《人民文库》出版前言

人民出版社是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始创于 1921 年 9 月，重建于 1950 年 12 月，伴随着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巨变一路走来，成为新中国出版业的见证和缩影！

“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这十四个大字就赫然写在人民出版社创设通告上，成为办社宗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版宗旨的表述也许有所不同，但宗旨的精髓却始终未变！无论是在传播马列、宣传真理方面，还是在繁荣学术、探索未来方面，人民版图书都秉承这一宗旨。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批为世人所公认的精品力作。有的图书眼光犀利，独具卓识；有的图书取材宏富，考索赅博；有的图书大题小做，简明精悍。它们引领着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一版再版，不仅在当时享誉图书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为挖掘人民出版社蕴藏的丰富出版资源，在广泛征求相关专家学者和老一辈出版家意见的基础上，我社决定从历年出版的 2 万多种作品中（包括我社副牌东方出版社和曾作为我社副牌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精选出一批在当时产生过历史作用，在当下仍具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珍贵史料价值的优秀作品，汇聚成《人民文库》，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需求，积累传承优秀文化。

《人民文库》第一批以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前出版的图书为主，

分为以下类别：（1）马克思主义理论，（2）中共党史及党史资料，（3）人文科学（包括撰著、译著），（4）人物，（5）文化。首批出版 100 余种，准备用两年时间出齐。此后，我们还将根据读者需求，精选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优秀作品陆续出版。

由于文库入选作品出版于不同年代，一方面为满足当代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阅读需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我们将原来的繁体字、竖排本改为简体字、横排本；另一方面，为尽可能保留原书风貌，对于有些入选文库作品的版式、编排，姑仍其旧。这样做，也许有“偷懒”之嫌，但却是我们让读者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体味优秀作品恒久价值的一片用心。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作为公益性出版单位，我们深知人民出版社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为人民多出书、出好书所担当的社会责任。我们将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再创人民出版社的辉煌。

《人民文库》编委会

自序

这是我的第一部个人著作。作为一个一辈子做学问的人,年逾七十,为什么以前从没有出过一本书,这才是第一部呢?

客观原因是由于:各个时期都有一些比写书更迫切需要应付的业务,不可能腾出时间来著书立说,写上几十万字。解放以前,主要是为衣食而要同时担任几种职务,或同时在几个学校开几门课,经常还要换开新课,终年忙于备课讲课。解放以后初期教学工作仍然十分繁重。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转入以科研为主,先后承担了几项大型集体编写任务的负责人,一项未完又上一项,直到现在还很难预计再过若干年才能摆脱。而我是极不愿意在列入国家计划的集体任务未完成以前自己先搞个人著作的。

除了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一些主观因素。首先是我写文章出手很慢,一篇东西总是要一改再改才肯拿出去,花的时间比别人多得多。因而在承担着教学工作或集体编写任务时,别人往往可以挤出时间来写出成本专著或大量论文,而我则实在无此能力。

更重要的使我写作特少的主观因素是我对著述的要求较高,我认为,在课堂上可以把别人的研究成果用作自己的讲授资料。所以我教书的胆子相当大,不仅开过中国通史、几门断代史、史学史、文化史、专著研究等课,连不属于本行的地理学、社会学的课也

教过。寒暑假期内说定,一开学就上堂,内容不是完全没有自己的看法,但大部分都是常识性的或别人阐述过的东西。但我对待著述的态度与此迥然不同。总觉得文章千古事,没有独到的识解,不能发前人所未发,写它干什么?写一部书至少基本上应自出机杼,人所共知的东西,何必写进去?前人已讲过的话,更不肯照搬。正因为如此,所以自我弱冠之年率尔操觚以来至今已半个世纪,只能断断续续写出一些零星论文,连讲义也没有编成过一部,更不要说撰写有组织有系统的专著了。

说来真正惭愧,不仅成本的书写不出,就是那已发表的几十篇论文,真正能达到自己心目中所悬鹄的者也不多。因而多年来朋友们和几家出版社不止一次鼓励我将这些文章辑成一编问世,我却兴趣不大,迟迟不敢应命。我有我的想法:旧作反正已经发表了,如有人要看,可以在旧刊物上找到,何必再费工夫去搜集汇编?有这个时间,再为集体工作多尽一点力量,或多写一二篇新作,不是更好吗?

我这种想法到最近几年才有所改变。

一则由于这些年来老一辈学者乃至中年学者出论文集的很多,看到人家都在出,自己也就心动。毕竟已经老了,若及身连自己的论文集也看不到一本,未免有点说不过去。

二则由于发现了有些错误的相传旧说,自己在几十年前业已为文驳正,却由于刊载这些论文的刊物目前已难以见到,以致错误的旧说仍在学术界里继续传播。例如:

1941年我在当时搬迁在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的《史地杂志》发表过一篇《播州杨保考》,论证见于宋濂《杨氏家传》(《宋学士文集》卷十一)的,以唐末入据播州的杨氏始祖为“其先太原人”,五传至北宋以同族宋初名将杨业的玄孙为嗣,“自是守播者皆业

之子孙也”这一说法绝不可信。播州土司杨氏先世实为唐代泸州边徼地区少数民族中的酋豪,后裔渐次汉化,遂依托为中朝名门之后,著于谱牒。宋濂为杨氏撰家传,自当以杨氏谱牒为本,因而传中记载,与史乘显相悖谬之处甚多,自不能因此文出于名家之手而遽尔置信。可是前几年史学界却仍然有人以宋濂《杨氏家传》为据,著文宣扬杨业的后裔在遵义做了几百年的土司。文中没有提到曾经有人否定或怀疑《家传》的可靠性,可见作者显然没有看到过我的旧作,否则他总不至于仍然径以《家传》为据而对拙作不加辩驳。

1942年出版的浙江大学《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刊》上,有我的《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一文,指出了丁文江在其《徐霞客年谱》中所提出的“知金沙江为扬子江上游,自先生始,亦即先生地理上最重要之发见也”一说是完全错误的。实际霞客以前千百年来有许多著作都载明金沙江比岷江更为源远流长,“霞客所知,前人无不知之”,不过前人因为“岷山导江”一语出于《禹贡》,《禹贡》既然被收入作为儒家经典的《尚书》,所以谁也不敢说《禹贡》错了,金沙江才是真江源。霞客“敢言前人所不敢言,其正名之功,诚有足多,若云发现,则不知其可”。这本《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刊》,解放后商务印书馆还重印过一次。可是近年来在报刊上为文介绍、宣扬徐霞客的一些作者,大概都没有看到过这本纪念刊,所以在他们的文章里,谈到徐霞客在地理学上的贡献时,依然都袭用了丁文江的那一套。

这种情况还可以列举几件,用不着在这里一一赘陈了。这就促使我感觉到把旧作汇集起来重新发表,不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有此必要的。

自己的想法有所改变了,组织上又大力予以支持,先后委派赵

永复、葛剑雄二位同志帮助我做编选、校定的工作,刘思源同志为我清绘插图,历时二年,始克定稿。三位同志为此都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在此理应致以诚挚的谢意。

全集分为上下两集,上集所收的是解放以前的旧作,下集所收的是解放以后截止发表于1981年的作品。编选的条件很宽,不问精粗深浅,只要基本上可以算是学术性的文字,都被选入了。只有极少数几篇,或由于对文章结论的正确性自己已有所怀疑,或由于当初发表时署的是别人的名字,如今再收入自己的集子似可不必,或由于发表时虽然署了我的名字,实际我只提供了一部分资料,执笔者并不是我自己,这些才在被删除之列。

上下集都是按文章的内容分类编排的,这样也许可以给读者带来一些方便。但不按成文年代的先后排列,读者便不容易看出我各个时期治学述作的经过,在这里我想就此略述梗概。

我在大学里受潘光旦先生的影响,选择了中国移民史作为研究方向。我的毕业论文即以《中国移民史要》为名,全文约七八万字,略述自上古直到清代国境内各族的迁移大势。写成后得到了潘先生的好评,认为经过一番修订补充,可以争取出一本小册子。但我自己觉得由于题目太大,写得太简单粗糙了,此后就一直没有肯花工夫去充实提高它。进了研究院以后,虽然不久就对魏晋南北朝史、中亚交通史都发生了兴趣,写过这二方面的学期论文,又由于和顾颉刚先生展开了关于两汉州制的讨论,从而提高了我在读大学本科时业已萌发的对沿革地理学的兴趣,但我到选择毕业论文题时,还是舍不得丢开移民史。不过此时的想法与以前已有不同,觉得要研究移民史,应该一个地区一个地区逐步搞,或一个时代一个时代逐步搞,而不应急于搞全面的史略、史要或简史,

搞清楚当前各地区人民的来历,才是研究移民史的首要课题。于是我决定主要根据地方志中的材料,按今省区一省一省地搞,先从材料比较好找的湖南省做起。半年之后,我写成了《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一文,通过答辩,毕业于研究院。又半年,1932年6月,刊载于燕京大学的《史学年报》,这是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翌年,南京中央大学所办《方志月刊》要求转载。此时我已放弃了一省一省写下去的念头,便把标题改成《湖南人由来考》以应之。但这篇文章只说明了出于汉族血统的湖南人的由来,在撰写此文搜集材料过程中,我又发现了近代的湖南“汉人”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出于少数民族血统,因而在1933年又写了一篇《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此后我的主要研究方向虽然转向了沿革地理,但对一地区人口的来历仍然很感兴趣,所以1935年一到广州,即有《粤东初民考》之作;1940年一到遵义,即有《播州杨保考》之作。除了按地区研究之外,同时也还选了几个特定时代做研究,1934年先后发表了《辽代“东蒙”“南满”境内之民族杂处》和《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二文。在研究移民史的过程中,不免要牵涉到对少数民族族源分布等方面的研究,因而后来在四十年代又写了两篇论述十六国北朝时代丁零族和一篇考证羯族的文章。

我在中学时代就对地理发生兴趣,特别喜欢看地图;在书报上看到一个不熟悉的地名,定要在地图上找出它的位置来。我的两个兄弟同样有此兴趣。记得有几次在寒暑假期内,我们兄弟间常常以考问某一个县名在哪一省哪一部分作为游戏,有时甚至还要问到这个县的四周是哪些县。在大学学习时代,我曾把历代正史地理志大致翻过一遍,注意到地方行政区划的变迁。有了这个基础,所以我当研究生时才会在班上对顾颉刚先生讲义中讲到的西

汉十三刺史部制度提出异议,开展讨论。(讨论函件当时由顾先生作为他的《尚书研究讲义》的附录印发给班上同学,1980年才作为史学界的一件档案由我交《复旦学报》发表。)这就更提高了我研究沿革地理的兴趣和信心。那年冬天我完成了毕业论文,虽然还没有正式取得研究生毕业证书,已有可能离校找职业。(那时燕京的研究生学制定为两年毕业。如果到时学分未读满或论文未写成,可以再拖上一二年。如不到两年学分已读满,毕业论文已通过,就可以不再留在学校里,但仍要到满二年时才算正式毕业。)寒假期间我的伯父把我推荐进北平图书馆当上了馆员。事有凑巧,原在辅仁大学历史系担任教中国沿革地理一课的柯昌泗先生,因家庭纠纷仓促离开北平。春季开学在即,学校不便将这门原定一学年的课程半途停开,一时又找不到有名望有资历的老教师接替这门课。正在为难,我的老师邓之诚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便向当时辅仁的代校长沈兼士先生竭力推荐我去接替。这个偶然的机
会,竟把我这个尚未正式毕业的研究生推上了大学的讲台。

1932年春我开始教中国沿革地理这门课。二年之后,顾颉刚先生又邀我协助他创办以研究沿革地理为主旨的“禹贡学会”,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从此沿革地理——后来改称历史地理——便成为我一生治学的主要方向。

可是,从1932年春到1934年底这三年,除教课外还得为北平图书馆做编目工作,1934年春以后又要为《禹贡半月刊》做编辑工作。并且教书往往不止一个学校,同时教上二三个学校;教的也不止一门沿革地理,还开过两门断代史。从1935年秋到1936年夏,离开北平到广州学海书院任教,又不得不停开沿革地理改开史学名著《通鉴》、《通典》、《通考》研究。1936年秋回北平,除在燕京、清华两校历史系开沿革地理外,又在清华社会系开中国近代社会

研究。抗战初期二年半留在燕京,除沿革地理外又得新开中国地理。所以从1932年初到1940年初这八年之内,能从事写沿革地理方面的文章的时间大致不到一半。这一时期除为《禹贡半月刊》写了一些以考订校正正史地理志为主的短文外,较长的有《新莽职方考》、《清代东三省疆理志》;也写了少数书评,其中较有分量的是《渤海国志长编评校》。

1940年春离开北平到贵州进浙江大学任教,1946年秋复员到杭州,直到杭州解放。在这九年半内,除教中国历史地理外,还教了中国通史、断代史、文化史、史学史等课,大部分时间仍花在备课教课上。又编绘了几幅用土纸石印的历史地图。所以述作还是很少。除上面已提到的有关移民和民族史的几篇外,历史地理方面较有分量的是《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秦郡新考》和《秦郡界址考》三篇。同时对辽史也研究过一阵,但取得的成果更少。

解放后第一学年仍在浙大,历史系停办,这一年专一学习马列主义,不教书,也不写作。第二年转来复旦。开始四年半除半年下乡搞土改,半年思想改造外,全力从事教学工作,教的是中国通史第二、第三两段,每星期都有六七节课。这一时期几乎停止了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只在1953年为顾颉刚、章巽二位先生所编的《中国历史地图——古代史部分》作了一番校订工作。

从1955年春起,此后约二十年中,只开过两学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的课,除参加政治活动和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停止工作三年外,全部力量差不多都放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上,能够挤出来写一些东西的时间甚至比以教书为主的年代更少。这一时期的述作主要是:

(1)1959年响应百家争鸣的号召,参与了关于评价曹操,讨论

蔡文姬生平、作品等课题的争论,对郭沫若同志的论述提出一些不同意见。

(2)1958年邻近上海市区的江苏省十县划归上海市管辖,1959年起在这些新划入上海市的西部地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报刊上一时刊载了许多文章说解放前中外学者说上海成陆历史不过一二千年都说错了,现在考古发现证实上海历史至少已有五六千年。我觉得解放以前的“上海”和1958年以后的“上海”所指地域范围相差太大,前者都在冈身以东,后者包括了大片冈身以西地区,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解放前说那时的上海成陆不过一二千年并没有错。搞科学研究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硬说解放前资产阶级学者的论述全是错的。因而从1960年起,我写了几篇关于上海成陆年代兼及上海得名和建镇年代的文章,目的端在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指出现今约有六千平方公里面积的上海市成陆年代先后相差达几千年,这几千年内海陆变迁极为复杂,既不能看作大陆不断在以同一速度向外涨,更不能因在西部发现了五六千年前的文化遗址就说全上海的历史都有那么久。

(3)1957年春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西汉河北地区时,发现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中的西汉河北水道画得不符合于《汉书·地理志》记载,而《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证明《说文》、《水经》又有讹误;西汉时河北平原诸大水是分道入海的,还没有像后世那样合流于天津形成海河水系。由此又不得不进而探索河北平原水系由分道入海演变为合流入海,亦即从《汉书·地理志》时代的情况逐步发展为《水经注》时代的情况的过程。正好碰上复旦大学在5月27日召开校庆学术报告讨论会,我便把这一番探索成果在历史系作了一次题为《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的报告。当时由于时间匆促,来不及写成论文,只写了一个报告提纲,附以几

篇用文言文写的考证水道变迁的笔记,打印分发给听众,并由邮寄发了几十份给有关单位和历史地理界的朋友。会后因忙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图集》工作结束后又忙于其它工作,竟直到今天还抽不出时间来把当时的报告提纲改写成正式论文付诸公开发表。但1957年印发报告提纲后因各方来函索取者甚多,又曾两次加印各数十份以应需求。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自己有所发现,尽管还没有写成论文正式发表,既然人家急于想知道、利用此项研究成果,我认为不应保密,应该有求必应。自1957年至今二十多年,已有许多书刊、论文、历史地图采用了此项研究成果,我从不以此为忤。但想不到去年竟有人(我曾寄赠报告提纲给他)以此为主要内容,写了一篇专文公开发表,文末还说这是他多年钻研的收获,这就不能不使我吃惊了。此人在学术界已有一定地位,不知何以竟无视科学道德一至于此?宁不可叹!

同年夏,我应侯仁之同志之邀去青岛,在疗养所里住了一个月,为他所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撰写其中《汉书地理志选释》那一部分。我只注释了全志一百零三个郡国中的六个郡,却在认真阐释的过程中,发现不仅在中原地区的河南河北,就是在西南的云贵高原,西北的河西走廊,《汉志》的水道经流都有和后世不一样的地方。这也就是说,全国许多地区的河流在历史时期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解放以前我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政区沿革范围以内,从这一年起,才扩展到了水道变迁的研究。

研究河北平原水道的下游及其海口必然要牵涉到渤海湾海岸的变迁问题,因此到1965年又写了一篇《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的大海侵》。不过我写的有关海岸变迁的文章倒并不始于此篇,这以前研究上海成陆年代的文章实际上也就是研究长江口南岸的海

岸变迁。

(4)三十年代中期禹贡学会同仁提出要把旧时代的沿革地理改造为现代的、科学的历史地理。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把研究广度从疆域、政区、都邑、河渠等几个项目扩展为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各个领域;二是把研究深度从满足于考证描述地理现象的变化,推进到探索这些变化的原因和规律,而后者难度一般有过于前者。五十年代以前,我在这方面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成就。多数文章只谈各个时代的具体不同情况,不谈何以会变;少数文章仅仅是语焉不详地带到几句。进入六十年代,才有所突破。

五十年代以前我讲中国历史地理这门课时,每次讲到历代黄河的变迁,除要讲到历史上历次重要决溢改道外,一般还要把历史时期分成几个段落,指出各个段落的不同情况,哪几段决溢频仍,不断改道,哪几段相对地平静无事。但我一直讲不清楚何以不同时期会出现迥不相同的情况。过去治黄河史的学者,惯于把各个时期黄河灾害轻重的原因,归之于时世的治乱和防治工程的成败。我觉得归之于时世治乱则与史实不符:实际上乱世黄河不见得多灾,治世往往反而多决多徙;归之于工程成败则于事理不可通,总不能说数千年来的治河技术一直在退步,贾鲁、潘季驯、靳辅等人主持的河工反而不及大禹和王景的工程有效。直到六十年代初我认识到黄河的决徙虽在下游,病原则在于中游黄土高原的严重水土流失,水土流失的轻重与植被的好坏密切相关,而当地人民的土地利用方式则是植被好坏的决定因素。我抓住这一关键因素的历史演变认真做了一番探索,这才基本上找出了各个历史时期河患轻重不同的根本原因。写成了《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我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

的研究论文,文章的结论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5)1958年安徽寿县出土战国楚鄂君启金节,节上的铭文是一件极好的说明当时楚国境内水陆交通路线的资料。考古学界不少人对此做了研究考释,但由于节文中的地名多难以作出确释,当然也就不可能理清楚当时的交通路线。商承祚先生移书以其中一些地名征求我的看法,我为了要答复他,不得不对节文中的地名和路线作一番全面考订,才在1962年写了一篇《鄂君启节铭文释地》。后二年这篇文章引起了黄盛璋同志的驳难,我又写了一篇答辩。前后二篇文章合起来,自以为基本上理清楚了节文提到的水陆路线,但仍有可商不备之处。1966年文物出版社准备将有关这个节的诸家考释辩难文字汇为一集出版,来函询及是否需要有所改动或增删。我当即动手写一篇短文作为前二篇的后记,对前二篇有所修订补充,未及成篇,十年浩劫开始,遂尔搁笔。前年想把这篇未成之作找出来写完它,无奈已经找不到了。

(6)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三幅帛制汉文帝时代的地图,其中最重要的一幅是长沙国西南部当时的深平防区(兼及邻近地区)的地形图。原图已断裂破碎成三十二大块和一些碎块,经故宫修裱工人裱糊成三十二片,文物出版社将这三十二帛片摄成比原物缩小一半的一份照片寄赠复旦历史地理研究室。张修桂同志费了很大力气将这三十二张照片拼接成一幅整图,1975年我据以写成了刊载于《文物》的两篇介绍、阐释文字。可惜由于三十二帛片原来的层次,经过揭开、裱糊后已搞不清楚,特别是那些碎块应与整块如何粘连,很不容易判断,所以张修桂同志所拼接成的图,与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所拼接出来的图,虽大体相同,但不尽相同。文物出版社在《文物》上和后来出版的《马王堆汉墓

帛书古地图》专刊里都只肯采用整理小组所拼的一种,不肯两种并用,因而拙文中的论述,有若干处与印出来的图并不相应。但我相信张图今后总可以印出来。

除上述几项外,还有一些零篇也写成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而发表于近年,如《金代路制考》、《陈胜乡里阳城考》等。所以要考金代路制是为了在编绘金代地图时需要对金代分路制度作一番通盘的了解。所以要考陈胜乡里是由于当时报刊上连续发表了几篇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

还有一些研究课题,文章虽写成于近年,材料、观点却也是在编图过程中搜集、形成的。如对云梦泽、洞庭湖和鄱阳湖在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我们所编绘的图,都是按我当时的研究成果画的,与传统说法迥不相同,但当时来不及把取得这些研究成果的考订、探索过程写成文字。编图工作结束后,我自己还是由于太忙,只写成了一篇《云梦与云梦泽》;关于洞庭湖和鄱阳湖的演变,都交由张修桂同志在编图时所取得的材料、看法的基础之上,再加以补充修订,写成论文,一篇是《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创刊号),另一篇是《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后者署了我和张修桂二人的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2 年第 2 期)。但我只提供史料和看法,未尝动笔,所以都没有收入本集。这三篇我自以为对历史时期长江流域地貌和水系变迁的研究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编图过程中还记下了许多考订历史地名的地理位置和政区建置沿革的文字,由于近年来我又忙于别的工作,抽不出时间来把这些东西整理成论文发表。经过整理已经发表了只有《元代的水达达路和开元路》一篇。

在以编图工作为主的二十年中,还插入过另一项国家任务,就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辞海》历史地理条目编写工作。我

作为这一学科的分科主编,大约花了一年多将近两年时间暂时把主要精力转入此项工作,自己写了几百条,又审查修改了二三千条。此项工作也并不是单纯汇集纂录前人旧说,还经常发现并解决了一些前人搞错或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只是受辞书的体例限制,不可能把词条写成研究论文。当时所收集的材料和论证过程都有记录,交《辞海》编辑部保管,和编图记录一样,这些记录我也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写成一条条小考证,公之于世。六十年代初已有这种想法,也曾试写了《北河》、《阴山》二条,用笔名投《中华文史论丛》作为补白发表。可惜此后未能继续写下去。

编图工作基本结束后,自1975年起,我的工作转入以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为主。我自己写了一部分水系变迁的稿子,又审阅修改了全书大部分稿子,1977年12月、1978年1月集中华东师大搞了两个月汇总修改定稿工作,于一月卅日结束回家,二月一日突发脑血栓形成。从此住院治疗了一年又八个月,因后遗症半身不遂不可能再进一步康复而出院。在住院期间,我并没有停止述作。1978年应《中华文史论丛》之邀,我请邹逸麟同志将我在《历史自然地理》中所写关于《水经》河水一节,改编为专题论文,稍加修订后以《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为题发表于《论丛》的复刊号即第七辑。这是我的一篇得意之作。古今学者讲到汉以前古黄河全都只知道有一条见于《禹贡》的河道,谁也不知道还有其它记载。如今被我从《山经》中找出这么一条经流凿凿可考,远比《禹贡》河水详确得多的大河故道来,怎不令人得意!1979年又陆续写了《云梦与云梦泽》、《辽后期迁都中京考》等三篇。当然,这些文章的资料都是在中风以前早已搜齐了或基本收齐了的。